

拥抱时代 服务人民

马明高

1942年5月，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两次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及其讲话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问题，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理论基础。从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其强烈的“人民性”特点，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经典文献，不仅为当时的革命文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其核心思想，在AI写作、短视频盛行，以及大数据分析和人民大众广泛参与文艺生产传播的今天，依然闪烁着真理的伟大光芒。

文艺的根本就是人民性。迄今为止，中外绝大多数优秀文艺作品证明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马克思很早就说过：“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列宁的话，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并且指出人民大众的主体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一观点确立了文艺创作的根本立场，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到延安时期“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提出，到新中国成立时“人民文艺”概念的提出，再到新时代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进一步阐释，文艺的“人民性”一次又一次地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如何从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文化视野中洞察

新时代以来文艺领域的深刻变化和重大变革，充分体现、发挥、彰显人民大众在这场文艺和文化深刻变化和重大变革的宏大能动力量，进而书写出优秀作品来，是摆在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前的紧迫而重大的挑战与使命。

许多敏锐而深刻的洞察者已经意识到，当下的文学写作处于一个关键的临界点。“在临界点的这一边，是传统写作在长期象征资本的积累下所建构的神话，并通过大学教育、经典阅读和评奖体系不停地加固其本身的信仰。在临界点的另一边，新技术、新媒体、新的传播方式与新的生活形式正在聚集，并通过种种途径来改变当代写作场域的力量平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语）“人民大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着文学艺术的生产传播，进而改变和塑造着一个时代的文艺形态。作者和读者、作品与观众的传统区隔正在被打破。文艺的接受者同时成为充满活力、充满热情的文艺创造的参与者，文艺溢出传统的场景、媒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语）

我们应该以宽阔的襟怀去拥抱时代，顺应变化，创新发展，积极应对数字时代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重新理解人民性，充分体现人民性，全力发展人民性，尊重人民大众涌现出的广泛的创造性。脚踏大地，因为大地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就是历史文化，就是天道人理，就是自然万物，就是人民和民心，我们要领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

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包括“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保持文化自信，以开放态度吸收人类文明成果。

面对AI技术对传统创作模式的冲击，既要肯定其人机协同创作、降低创作门槛的特点，也要防止其泛滥导致创作的同质化、浅表化，削弱文艺作品的独特性和思想深度。短视频创作是普通大众表达自我、记录生活的一种文艺手段，但必须警惕其出现的低俗化、碎片化倾向。大数据分析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精神需求，但必须警惕为了流量和偏好口味，生产低俗、猎奇、煽情的内容，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统一”的原则，坚持文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艺术家，当文艺真正属于人民时，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但必须引导新大众文艺在积极表达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情感的同时，强化其艺术思想意义、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我们应当在服务人民、贴近群众、培养人民的文艺创造力的同时，更加投身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和内心世界，挖掘深度与独特性，发挥文学深度刻画人性、探索复杂主题的优势，充分理解“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的新时代特征，不仅要写出人民对于物质生活的积极改造，而且要写出人民精神世界中的奋斗与拼搏，写出人民对精神生活的热烈向往与追求。

双塔

水印图

喜欢王勃，确因了那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天涯的浪漫，比邻的现实，一刹那归拢于一处，心头那浓郁的离愁别绪一下子散去了沉重的意味，涌上来自明媚的希冀。这多好呀，即便你远走天涯，相隔千山万水，对于我，还和过去一样依旧是比邻而居的感觉，那是因为你从未从我的心中离去，拉开的只是物理距离。或许还因了这物理距离的拉开，心的距离更贴近了呢，何必伤感。离歌响起，不诉离肠。

王勃作为“初唐四杰”之一，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一起，一改齐梁浮艳诗风，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题材扩大，思想严肃，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的诗风，成为真正的唐诗的揭幕人。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便体现了文风变革的审美追求。

抒写离情别绪之作，古代诗歌中不计其数。但是“诗要避俗，更要避熟”。王勃一洗离别诗之悲酸伤心之态，将意境提升至开阔之地，音调爽朗，独标高格，可谓奇峰突起。是啊，我和你同样宦游他乡，这次离别不过是客中之别，是无数次离别中的一次，不妨豁达些洒脱些，毕竟，离别也是为了更好地重逢。诗人选择了对未来重逢满怀信任的态度。

王勃是绛州龙门（属今山西运城）人，出身书香世家。祖父是隋末大儒王通，王通的弟弟王绩是著名诗人、儒学大家。王勃自幼聪慧，十几岁考中幽素科。幽素科是在正式的科举之外，皇帝为了招揽一些特殊人才而开设的考试项目，主要针对的是山野隐逸之人。唐朝隐居修道的风气盛行，其中一个世俗的原因是，修道是一个做官的捷径，一旦隐居出名声来，会被朝廷直接征召，这比考进士要快捷。而且隐居修道还可以参加一种特殊的科举考试，幽素科就是这种特殊的科举考试。征召对象基本是小隐隐于野或者大隐隐于市之人。这样的科举考试，体现了大唐“野无遗才”的开明以及对选拔人才的重视。

王勃才高八斗，不仅仅是诗人，还是学者，他对儒学、史学、历法等都有研究，有过专著。但在唐朝当时，他的价值并未得到普遍认可。杜甫为之鸣不平，写了首《戏为六绝句》（其二）：“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当时文坛上存在贵古贱今、好高骛远的习气，否认唐初诗人的贡献，随便诋毁唐初的文人。杜甫在这首诗中既明确地肯定了王杨卢骆“初唐四杰”的文学贡献和地位，又告诫那些轻薄之徒不要一叶障目而讥笑王杨卢骆，他们的诗文会像滔滔江水一样万古流淌，传之久远，其历史地位也是不容抹杀的。同时也体现了杜甫反对好古非今的文学批评观点。“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其中的“不薄今人”“别裁伪体”学习“风雅”“转益多师”等见解在今天同样有借鉴意义。

再回到送别诗上来。唐朝的送别诗很多，不仅仅体现了审美功能，更体现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当时由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太有名了，就有诗人效仿，譬如唐开元年间名相张九龄就写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但和王勃的这句相比，其意蕴味道上还是差了点，生硬了许多。

王勃还写过一首《别薛华》，其中四句：“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辛苦。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离别之际，你我的心情就像浩渺的江水四处漂泊，宦游生涯苦涩而酸辛。但是不管分别还是在一起，我们都会在对方的梦中出现。细细体会，梦中相见是荒凉而温暖的，是忧伤而浪漫的，是贴近了灵魂的。如果说“天涯若比邻”是一种心灵的感觉，那么“俱是梦中人”则是精神的依偎。每天在一起，我们在梦里相见；天各一方，我们在梦里相见。杜甫想念李白，写下“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深邃而绵邈的情谊，在梦里化作悠长的思念。那份悠长，带着过往岁月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也镌刻了精神与灵魂相互契合的丝丝缕缕。

明代文学理论家陆时雍曾作评价：“初唐四杰”以王勃为最高，他的诗“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王勃的诗歌之美，既有唐代的健康爽朗，也有六朝时期的精工美艳。重读王勃，是一种审美享受。

天涯比邻话离别

边云芳

文化根脉闪耀在字里行间

——王永福散文集《回望》读后感

陈克海



《回望》书影

最早知道王永福先生，是去年。听说张石山老师在病床上读完王永福散文集《回望》书稿，精心撰写了一篇近四千字的序言。序言里如此写道：“非常可贵的是，所谓回望，却并未陷入简单的回忆与事件罗列，行文当中、字里行间，不唯情感充沛，抑且理性昭然。”“能够真切地感知作者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传统文明、乡土文明，充满温情与敬意。”

事实上，起初我是带着求证，或者说挑剔的心态去读《回望》（北岳文艺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的。

一开始并不太容易沉浸进去。我平常读一些小说，深信“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好多年都抱着类似偏见，想当然地认定，任何文章要写得生动，更能让人感同身受，把人物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有机串联起来，恐怕要比作者的宣传和教诲来得更加自然。因此一看到作家上来就用一些总结性的陈述，心里不免抵触——单讲散文的写法，还有记录的内容，委实传统了些。换句话讲，习惯了平素的阅读口味，一下子看到一本集子总是绕开具体的人事，把人放在传统文化的一些概念里评判、厘定，我多少有些不适应。不过读到后来，在作家的穿插交代中，大致弄清了一些事实，或者说，在作家不乏节制的叙述中，读到了个人在历史当中的遭遇。

有几个细节一下子让人记住了，比如在《岁月长河》这一篇里，写道父亲参加解放太原支前担架队，战争结束，父亲老是重复地说：“太可怕，太惨烈了，死的人太多了，死人堆得比太原城墙还要高。”这些记忆可以印证历史书写中战事的惨烈。牺牲者的功德早就铭刻在历史的记忆里，父亲作为战争亲历者的这些大时代下小人物的生命体验，在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作为宏观历史的补充和注脚。

又比如在《慈母润心》里写母亲生逢乱世，一生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时期。虽然作家只是简约提到一些历史概念，没有铺排具体的生活细节，但母亲的一生，恐怕也是一部《生死疲劳》的挣扎史，也是另一部现实版的《活着》。自己活下来，且把9个孩子抚养成人，不光需要运气，更需要智慧。《一生坚守》里写道，母亲说：“吃不完，穿不完，计划不周一辈子穷。”为了让子女们吃饱穿暖，让家里过上好生活，母亲到“黑市”上买卖细粮；为了给儿子娶媳妇，第一个站出来承包生产队的土地，挣钱盖起了新窑洞；为了供子女上学，在村里开了第一个小饭店；为了攒养老钱，又养起了牲口。这些事情，对一位农村妇女而言，迈出每一步，恐怕都没有那么容易，要跨过那道坎，其间不知遭遇了怎样惊心动魄的磨难。

等到习惯了作家的讲述方式，也就能从他反复重申的一些概念和立场中，更容易理解那份在他内心烧得滚烫的深情。比如《人格尊严》《良心账本》《功德传家》等篇章，更是从精神层面深入挖掘父母对作者的影响。也正是在大量的类似书中，一位父亲、一位母亲的形象在传统文化的谱系里逐渐得到了丰满的呈现。父母以自身的言行，为作者建立起做人的标杆，他们坚守的尊严、秉持的良心，成为子女一生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传承的书写，超越了简单的亲情表达、单纯的情感依恋，最终上升到文化与道德传承的高度。

以上简略概括，不过是《回望》一书的第一小辑部分内容。作为一部回忆性质的散文集，作家书写的天地要

比我信笔概括的更为广阔，他不仅书写了在苦难中奋斗的父母形象，也勾勒出了一幅亲情友情的斑斓长卷。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父母长辈，还是乡村邻里，那些传统的道德观念与美德似乎与生俱来，早已内化在他们的言行举止当中。这些人物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看起来是单纯的回忆，每一个个体又是活生生的传统文化样本，其间流淌的人性光辉，对作家一生的文化滋养，不言而喻。

当然，除了这些记人的部分，文集里还有大量的述事，比如对童年趣事的捡拾，那些逛庙会的精细描写，故乡传统习俗的生动记录，还有对家族谱系、村邻交往、日常器物的整理归纳，个体经验一旦放置在乡土中国的褶皱里，就会逐渐升华为集体记忆的切片。《轩辕怀古》《精神图腾》几篇，更是从故乡的历史遗迹、文化传说中，探寻故乡的精神源头，挖掘故乡的文化价值，追溯与敬仰民族文化根脉。毫无疑问，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弥散在字里行间。

若说遗憾，或许是某些篇章囿于伦理和人情，抒情稍嫌过度了些。譬如父母一生的命运转折大有文章可做，却因为作家倾心于对传统文化的讲解，那些历史中的疼痛如同惊鸿一瞥，最终消散在似有若无的记忆里。当然，人和人的偏好有别、认知不同，我又怎么能用自己的阅读趣味去强求他人？

《回望》一书与其说是作家对家园的回忆、朝圣，不如讲是对故土、对藏匿在民间的文化重新考古。他不断擦拭着现实与记忆的叠压层，在对亲情、友情、童年、故乡的书写中，始终贯穿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热爱、对故乡文化根脉的坚守。



在太原淘书

韩晨光

博古书店

幸得人指点，说古籍书店对面往北一点还有家旧书店，于是过去碰碰运气。过街一看，是居民楼底商的一个小门店，店招“博古书店”。

老板是个芮城老哥，别看门面不大，选书很硬。购《纪念傅山诞辰400周年丛书》之《傅山诗选》和《傅山文选》两部。在太原读青主，在忻州读遗山，是属于山西人的浪漫。2005年前后，我大学刚毕业短居太原，频频往返双塔之下。记得青主给双塔寺雪峰和尚写诗，说起喝茶，两人意态无聊，“想起一茶送，闲心半句酬”，而喝起酒就来劲了，“酒人应得度，酗（意为酒糟鼻）面是津舟”，顶着酒糟鼻子的两个老酒虫才知佛法真意，俗世的清规不妨扔到塔顶。每每想起此诗，就觉得好笑。2017年重返旧地，知交零落，久疏音信。欲将心事佐酒，终不得对面之人。夜半无眠，得杂句如下：“少年意气诗酒间，并州杯冷逾十年。一夜呼吸生平短，双塔影长听杜鹃。”奈何奈何。第二年夏末到中北大学公退，退公之后去旁边的窦大夫祠访古，又见青主遗迹。从祠堂出来，见村民团聚前跳广场舞，得打油诗四句：“晚晴渐隐大夫第，早秋未染青庄窠。寒泉久涸书声远，市井新传柳永谣。”

淘得几本好书，三本是山西古籍出版社的“当代学者文史丛”，可视为书话。两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清人别集丛刊”：朱彝尊《曝书亭集》和陈梦雷《闲止书堂集抄》。这个系列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择善本影印的，字体规整大气，版式清简。

朱彝尊与陈梦雷都与山西有缘。陈梦雷有《拟游五台山不果》诗，言：“策马长安看未得，西风回首暮云遮。”陈梦雷因三藩之事谪居日久，《闲止书堂集抄》即由其仆人杨昭代刊，故当时的诗作多沉郁痛切之词。

朱彝尊写了五台山的万佛朝圣：“图经曾识五台名，想见从帐殿生。节物乍分春恰半，登临最好雪初晴。林香紫鹤风，月黑金莲照地明。定有山灵呼万岁，不徒龙象下方迎。”（《驾幸五台山恭纪三首之一》）朱先生与山西缘分很深，清康熙三年（1664）到大同投曹溶，至清康熙六年（1667）的几年间宦游山西各地。关于在山西当官的感受，他在《送冯祖宰平陆》里说：“著书独有五亭好，作吏无如三晋闲。”

古籍书店

从汇真书店出来，沿水西关南街骑行一段折东，从解放路往北几百米，就是古籍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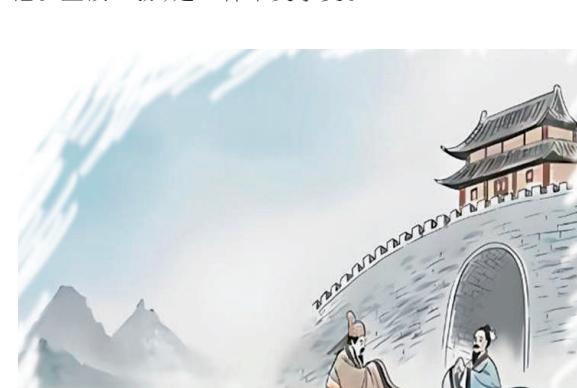
古籍书店给我两个意外，一是身为古籍书店却装饰有西方现代的藏书票，二是身为古籍书店古籍却很少，大都是现代书。店员说现在古籍行业不好做，古书放在库房了。失望之余仍购书一本，是郑振铎与冰心等人当年考察晋北、内蒙古的随笔合集。郑振铎与冰心等人这次西行之后，一直对晋北文物古迹念念不忘。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文物考察团——雁北文物考察团，委任专家重走当年路，并形成了新中国第一份正式的文物调查报告。

鑫源书店

从博古书店出来，东行到了府东街和五一街交叉口的鑫源书店。书店门脸不大，内有乾坤：里头三间房满满当当都是旧书，且叠摞在一起，翻检不易。



2025年5月15日《太原日报》第8版刊发的《追本溯源释委顿》一文，因编辑工作失误导致作者署名错误，特向原作者曹晓冬先生、署名作者蔡亦凝先生和广大读者致歉。
副刊部



经典漫谈
(58)